習主席是毛主席再世　陳小魯為革命道歉在安邦發財
薄熙來精神高揚中國　劉源繼承父親投機基因下場一樣?



目錄

鼓吹專政：在遍地乾柴處玩火

（代序）

這個國家最富的權貴集團，仍然會習慣性地認為自己還是無產階級的代表。但"階級鬥爭"的魔鬼真從瓶子裡放出來了，"專政"的鐵拳該打擊哪個？

曾任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主席的英國科學家亞瑟·艾丁頓，講述過一個寓言：有個人使用一張網眼為3英寸的漁網來研究海洋生物。在接二連三、重複了N次捕撈起標本之後，他慎重地得出了研究結論：所有海洋生物的身長都不小於3英寸。

這個寓言告訴了我們：用什麼網眼的漁網，決定了能捕撈到什麼樣的魚。

打撈歷史時，各人都有自己的一張漁網，像魯迅筆下的狂人，漁網的網眼是“吃人”；其他人，有的網眼是“革命”，有的網眼是“民主”，還有“科技進步”“個性解放”“文化交融”，乃至“弱肉強食”“禮崩樂壞”……

毛澤東自用的漁網，網眼是“權謀”——余英時說毛“熟讀歷史，但是完全不相信歷史上有什麼光明磊落的一面。他留心的大概都是權謀機詐一類的東西”、“滿眼看去只見到‘髒唐臭漢’”。

但這樣一張漁網，毛澤東只能自用，哪能示人？作為領袖，為了統一思想和輿論，他號召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用一個統一型號的漁網，網眼是“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毛澤東語錄）

"堅持專政不輸理"？

這張漁網，傳到了21世紀中國紅色翰林院的掌門人王偉光手中。王院長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說：“這就決定了國際領域內的階級鬥爭是不可能熄滅的，國內的階級鬥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在這樣的國際國內背景下，人民民主專政萬萬不可取消，必須堅持、鞏固、強大。”

若蒙上刊登的刊物名稱和時間，可以說它出自1960年代初的《紅旗》，也可以說它出自1970年代中期的《學習與批判》。唯一的區別，只是將“無產階級專政”改成“人民民主專政”——“人民”在哪裡？“民主”在哪裡？他端出的還是一篇半個世紀前的舊稿。或許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不僅放之四海而皆準，而且歷經百年而彌新？

這篇文章立刻被《環球時報》等多家官媒轉發，社科院自己的《社會科學報》、中國社會科學網等密集刊文，力撐其掌門人：《人民民主專政是我們的“主要經驗”》、《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是正義的事業》、《人民民主專政與改革開放相輔相成》、《人民民主專政不可須臾離開》……

值得一提的是，10月11日，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等社團在京舉辦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理論座談會，同一天《紅旗文稿》刊出其會長劉潤為的《依法治國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篇文章點明了這一波“階級鬥爭”“專政”攻勢的矛頭所向：那就是“法治”。“法治”要求一切人包括最高執政集團，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視同仁，這位前《求是》的副總編卻說，“如果用法治來否定、代替人民民主專政，就上了‘普世價值’的當，那法治就會變味，其結果是既得利益者即國際資本和國內買辦佔盡便宜，而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吃虧。”

多麼熟悉的思路和語言！像不像48年前毛澤東親筆批改過的“五一六通知”：“我們對他們的關係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而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關係，即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獨裁或專政的關係……”

明白了：中共中央宣佈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將是“依法治國”，從王偉光到劉潤為，他們搶先發表這些言論，就是要影響和牽制這屆全會即將討論的議題、即將做出的決議。

兩條救國之道

當今中國有沒有階級？當然有，甚至可以說，階級分野之深刻、之鮮明，在中國算得上史無前例。

比如，彭博社報導，中國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70名最富有代表2011年的財富淨值，就超過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全部535名議員、美國總統及其內閣成員、九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財富淨值的總和！全國人大名副其實地成了“富翁俱樂部”——凡稍微了解一點中國政情的人都知道，人大不過只是橡皮圖章，遠非權力中樞，中共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國務院及內閣成員，若將家族財產公開，胡潤中國百富榜必將立即大幅改寫。

中國研究機構的說法又如何？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發佈“中國民生發展報告2014”指出，2012年中國基尼係數高達0.73，1％最富有家庭擁有全中國三分之一財富，25％最貧困家庭擁有財富總量僅1％左右。另一說法，中國億萬富翁逾九成是高幹子弟。這不是階級又是什麼？

階級存在，必然有階級矛盾和衝突——若處理不當，激烈起來，也可以說“階級鬥爭”。中國的勞資糾紛、徵地、罷工、群體性事件，不都是階級衝突？就是眼下的香港佔中，也能讓人看到階級衝突的影子。而中國民眾要求官員從上到下公佈財產，以各種方式揭露權錢勾結的既得利益集團，甚至可以說是當前中國階級矛盾的焦點之一。

階級和階級矛盾存在，是大家的共識。問題是怎麼對待、怎麼解決？

1852年，馬克思在致約・魏德邁的信中說：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的階級和階級鬥爭，都不是我的功勞，“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2）階級鬥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更尖銳指出：“誰要是僅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據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們研究，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中國經濟和社會，雖然存在嚴重問題，但階級分野和衝突並不突出，遠不如今天這樣矛盾尖銳。然而中共創立，立即開始了鼓噪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毛澤東是中共推動階級鬥爭最堅決、最徹底的領導人，也是把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和中國帝王駕馭術融合得最好的革命領袖。在毛澤東眼中，階級鬥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者與非馬克思主義、假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對中國的農民問題、勞工問題等等所有社會問題，他一概寄希望於通過階級鬥爭奪得政權、再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得到解決。“打土豪分田地”、“窮苦人翻身得解放”、“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成了中國革命的主旋律。毛澤東從60年代初期開始，更逐步將階級鬥爭當成“綱”，以此掀起社會更對立、更動蕩的系列政治運動。

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的孫中山，在階級鬥爭問題上，倒是難得地頭腦冷靜。他在最走投無路的1921年12月與蘇俄專使馬林在桂林見面，雖然對其介紹的蘇俄革命和紅軍建設很有興趣，但明確表示不贊成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在孫中山看來，階級鬥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不是推動人類文明的動力，相反，階級鬥爭破壞人類文明，“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

孫中山這種態度引起列寧震怒和嚴辭批判，此前列寧發表火藥味甚濃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認為必須“批判孫中山的小資產階級空想和反動觀點”。在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分野，正是後來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國共產黨之間齟齬不斷，最終你死我活的根本原因之一，也由此形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的兩大道路之爭。

其結果，我們今天都看到了。信奉階級鬥爭學說的共産黨擊敗了反對階級鬥爭學說的國民黨；隨後這套學說卻將掌了權的共産黨引向慘敗，將整個中國——除了國民黨統治的台灣——都拖入了曠世浩劫。

階級鬥爭學說遺禍深遠

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今天看來實在是大謬不然；經過列寧的再創造，再加以毛澤東“有中國特色”的發揮，更推到了讓馬克思也瞠目結舌的地步。

其一，它無限擴大了階級分析的範圍。階級劃分僅僅是觀察視角之一、多種網眼的漁網之一，不能僅憑它去打撈豐富多彩、不斷發展的全部世界。對人群的劃分方式還有多種：國家、民族、膚色、宗教信仰、財產甚至性別。人類歷史上各種衝突，國與國之間戰爭與吞併，不同宗教信仰之間的戰爭，無論次數、規模，還是持續性、災難性，都蓋過了奴隸揭竿而起、農民起義、工人暴動。遠了不說，上個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怎麼能納入階級鬥爭的“網眼”？

其二，它惡性刺激了階級對抗的烈度。在階級鬥爭理論持有者看來，人類社會只要有貧富差距，就必然互相敵視、相互廝殺不已，暴力就是人類生存的基本狀態。其實，社會是對立統一體。階級矛盾主

要表現為利益之爭、利多利少之爭，鬥爭不是唯一主題，有鬥爭也有合作。幾個世紀以來，經過各個社會階層之間多次博弈、磨合，國際上和各國國內，窮人的生活有所改善，底線被抬高；統治階層也調整策略，倡導“雙贏”。階級矛盾雖然存在，但並非定要走向鬥爭，而往往是可以在法律框架下尋求解決的。借用薄熙來和汪洋的“蛋糕之爭”的比喻，如何切蛋糕的爭執雖然不可避免，但弱勢一方總還有蛋糕可吃，隨著蛋糕做大，甚至還有盼頭。用著名左派評論家冼岩的話來說，這才是一個社會“可持續的正常狀態”，而當初的“野蠻資本主義”，其實屬於非正常狀態。

其三，也是最嚴重、最深遠的惡果是，它最大化地釋放人性惡。階級鬥爭理論在各國革命實踐中，無不打開潘多拉的盒子，結合本土的負面民族素質，激發了激烈、殘暴的獸性。在蘇聯和中國，奪走了數千萬人生命，在朝鮮、柬埔寨、阿富汗、越南、東歐和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千百萬人受難。

就中國而言，這種理論指導之下政治運動連綿不斷，短短三五十年時間，就顛覆了數千年建設、積累起來的文化傳統。掌權者用階級鬥爭的烈焰將民眾鍛造成寒光凛凛的利刃，暴行成為民眾的集體行為，尤其是成為青少年的時尚儀式。任何人，只要被宣判為“階級敵人”，民眾便獲得了對之“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教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的許可令。天天、月月、年年如此灌輸“仇恨入心要發芽”，在精神上仇恨就確實發芽、抽條、長葉，綻開血腥的“惡之花”。中國人被階級鬥爭理論蠱惑而“大義滅親”，出現難以計數的子女揭發父母，夫妻相互告發，學生批鬥老師，群眾侮辱毆打甚至虐殺同事、鄰居的事例，道德倫理毀滅殆盡。

有一位學者朋友告訴過我階級鬥爭理論靠什麼毒化心靈——恐懼。這種理論的邏輯，就是“非白即黑”“非我（友）即敵”，“沒有調和的餘地”，更沒有中間地帶，“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而“對人民的殘忍”，自然就意味著自己成了敵人，成了階級鬥爭的對象。那麼，惟恐被逐出“自己人”群體、被打入另冊（“入另冊”，這也是毛澤東的著名提法），這種恐懼心理，就驅使著人們對被認定的“階級敵人”加倍殘忍——越是沒有“根正苗紅”這項先天條件，越要竭力靠後天的激進表現來証明自己不是“階級敵人”！

玩火者自焚

冷藏多年的“階級鬥爭”“專政”學說再次出籠，表明了中共當前左右為難的困境。一方面，中共是以階級鬥爭起家的，無論成功奪權有多少內外因素，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政治動員，都肯定是不能忽視的關鍵。那麼，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這一政權歷屆繼承人，都不能放棄這一理論，必須強調“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但另一方面，他們只有走資本主義私有化道路才能發展經濟，增強國家實力。自江澤民不得不提出“三個代表”始，讓本應歸屬資產階級的民營企業家入黨，執政理論已陷入自我矛盾，難以自圓其說。無怪乎這次有人解釋王偉光、劉潤為何以大發妙論，因爲中共只有重新祭起“階級鬥爭”和“專政”的大旗，才能重新佔領道德制高點。

但是，共產黨人奪權之後，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生產資料實現了公有化，原本意義上的“剝奪者”已經被剝奪了；後來中共又建成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確立了公有制，國內所有人，私人都沒有了生產資料，那麼自然也就沒有了資產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又怎麼可能“長期存在”？毛澤東晚年遇到這樣的難題，只好“另闢蹊徑”，既然難以從經濟上劃階級，於是强詞奪理地從思想上、政治上劃，一直到劃出一個“黨內資産階級”。

今天呢？如果要強調階級鬥爭，那就非得劃分階級、弄清陣線不可，否則敵我友豈不攪成一鍋粥？但中國現在除了下崗工人和失去土地、四處打工的農民，還有哪些人敢說自己是“無產階級”？中國學者張鳴不無諷刺地說過，“這個國家最富的階層，最富有的官僚集團，仍然會習慣性地認為自己依舊是無產階級的代表。”如今統治中國的袞袞諸公，包括王偉光、劉潤為，縱然會復述中共黨章冠冕堂皇的定義說黨就是“無産階級先鋒隊”，但他們敢大言不慚地自稱是“無產階級”嗎？公佈自己財產並講清來源，如何？

這是許多人的疑問：階級鬥爭的魔鬼真從瓶子裡放出來了，“專政”的鐵拳該打擊哪個？最富有的人呢，還是最不聽話的人？如果不聽話的人是窮人，該怎麼辦？

這個社會積累了那麼多矛盾，一旦階級鬥爭重開，必然意味著一個底層造反的動蕩時代再次到來。到處都是一堆堆的乾柴，王偉光、劉潤為們卻敢劃火柴！莫非真的忘了那句古話：玩火者自焚？（高伐林）

紅衛兵執掌中國

"大學紅衛兵"剛剛退休，"中學紅衛兵"正在當權，而紅小兵們則正在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級別等待著掌權——中國政壇、商界與社會，重新進入了紅衛兵時代。而這些紅衛兵們又將為中國帶來些什麼呢？

中國每個時代都對年輕一代持悲觀態度，總是指責和擔憂年青一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國將不國，然而現在，部分老年人的所作所為才真正令人感到了擔憂。

2014年的中國，關於老人們的負面新聞可謂層出不窮。唐山老人廣場舞打擾到附近學校，高中生站立抗議，卻遭到了老人的羞辱；廣東汕頭兩名高三學生扶起了騎電動車摔倒的老人，反而被老人誣陷訛詐，報警後才獲清白；更有甚者，西安一位老人因為女孩不肯為其讓座，竟然一屁股坐在女孩身上……大江南北，莫不如此！



紅衛兵曾大鬧中國。

紅衛兵變老了

有人說中國的老人們怎麼了？是老了變壞了，還是壞人變老了？而坊間多數評論則認為：是紅衛兵變老了。

是的，曾經參與"文革"的小紅衛兵們如今多已到了50～60歲左右，正如網友所調侃的：幾十年前，年輕人在廣場上跳迪斯科，不顧老年人的感受；現在老年人在廣場上跳廣場舞，不顧年輕人的感受。幾十年前，年輕的紅衛兵打砸搶，禍害了一幫老年人；現在一些老年人"碰瓷"、訛人，自己摔倒就坑人，又禍害了一幫年輕人——整了半天還是原班人馬！

縱觀今日之中國，各個領域，各行各業，真正掌權的人幾乎都是50以上歲數的人，大到中央政治局，小到民間私企或者一個家庭。當年的紅衛兵司令，而今已成共產黨的棟樑；當年的紅小兵小將，而今最小也當了家長……顯然，紅衛兵已經全面接掌中國。

那麼他們又究竟是一群什麼樣的人呢？

在歷史上，紅衛兵是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由學生組成的特殊人群。最早的紅衛兵名稱來自一位清華附中學生、後來著名作家張承志的筆名（根據駱小海與宋柏林的回憶，張承志最早的筆名是"紅衛士"），意為"保衛毛主席的紅色衛兵"，在1966年5月29日清華附中預科651班所貼的大字報上開始使用。6月分以後，其他中學學生所貼的大字報就紛紛效仿署名"紅衛兵"。而到了8月，毛澤東接見並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之後，紅衛兵更是到處耀武揚威，打砸搶抓……

紅衛兵的典型形象，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袖標，手握紅寶書。

紅衛兵並不是一個統一的組織，派別林立，互不隸屬，互相鬥爭。根據時間、出身和政治主張，大概可以分成四大派系：

老紅衛兵，也簡稱"老兵"，最早的紅衛兵，幹部子弟，支持血統論，例如"聯動"，但"文革"後不久很快失勢；保守派，又稱保皇派，老紅衛兵的跟從者，大部分人出身貧苦，聽從黨組織；造反派紅衛兵，成分複雜，主張聽從毛澤東"造反有理""炮打司令部"的號召，最典型的，如蒯大富等

北京紅衛兵造反派五大領袖；極左派紅衛兵，他們將批判的矛頭指向中國現行基本政治和社會制度，典型的如長沙楊曦光寫了《中國向何處去》。

眾所周知，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紅衛兵在“文革”中給中國帶來了極大創傷。他們的宗旨包括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資產階級保皇派”，“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等。手段有大字報、大批鬥、“破四舊”、“抄家”等，而“打砸搶”的行為時有發生。他們的造反行動沖垮了各級黨政機關現成的運行體系，成為毛澤東進行“文化大革命”、達成其政治目標的工具之一。

這樣一批紅衛兵接管中國之後，他們又將把中國領到何處去？一個令人近乎絕望的事實是：從彭宇案開始，無論是在民間還是在商界、政界，以殘忍與貪婪著稱的“壞人”們，正將中國引入另一層意義上的“紅衛兵時代”。

1966年，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中最能夠起作用、活動能量最大的，是“革命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子弟組成的“聯動”一類紅衛兵組織。他們就是今天被稱為“紅二代”的人。“文革”前夕、毛澤東提出“革命接班人”問題時，他們就大言不慚地聲稱：這紅色江山是我們的父輩打下的，我們不接班，誰接？如今，他們終於接班了。

旅美文革史專家宋永毅表示：“廣義來說，現在中共在位政治局委員都是紅衛兵，胡錦濤和溫家寶是‘大學紅衛兵’，薄熙來和習近平那批人是‘中學紅衛兵’，李克強是紅小兵……”時至今日，“大學紅衛兵”剛剛退休，“中學紅衛兵”正在當權（中學紅衛兵當年是最瘋狂的一茬），而“紅小兵”們則正在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層級等待著掌權，中國政壇已經進入了至少為期十年的紅衛兵時代。

政治局常委都是紅衛兵

眾所周知，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江澤民與曾慶紅為了狙擊中共元老李瑞環，搞了個“七上八下”人事規則（即：67歲，還可以新任或連任一屆政治局常委，68歲，必須退休），迫使當時68歲的李瑞環下台，“七上八下”最終成為了一個黨內的政治規則。所以中共政治局常委多在62歲左右，而稍低級別的政治局委員與中央委員則多在55歲左右，而這些55～65歲的政客，算一算出生年月，多為1950～1960年呱呱墜地，那麼，在“文革”期間，他們不是在上小學就是在上中學（後來少數人當過“工農兵大學生”），他們幾乎無一例外，當過“捍衛毛主席”的紅衛兵。



張德江

在中共政治局七常委中，習近平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父親習仲勛因牽涉“小說《劉志丹》案”被打倒，被監押到北京衛戍區。被抄家後，習近平隨母親遷居中央黨校。1966年12月初，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成立。但習近平被歸類為黑幫子弟，無法參加紅衛兵。有人據此認為習近平並沒有參加過紅衛兵，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根據“維基百科”記述，習近平在中共高幹子弟雲集的北京101中學就讀，革命熱情高漲的習近平仍然和童年夥伴、後來的“中國棋聖”聶衛平參加了聯動外圍組織紅衛兵，並且利用大串聯之機公費參拜“革命聖地”韶山。1968年12月，年僅15歲的習近平積極響應毛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

下中農再教育”，與上萬名北京知青一起，前往陝西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

插隊勞動的辛苦程度遠遠超出了習近平的想像，他初期很不適應，“別人下去天天上山幹活”，年少的習“卻很隨意”。由於怕累，幾個月後他甚至偷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後被放出來，聽從姨夫魏震五的建議又回到梁家河。這次他終於很快成為一名壯勞力，“365天不歇”，扛200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

1946年出生，在“文革”時剛滿20歲的張德江也是個積極的紅衛兵，1968年11月，響應毛澤東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在吉林省汪清縣羅子溝公社太平大隊插隊，加入了共產黨，並在1972年5月受推薦進入延邊大學朝文系學習，成為“工農兵學員”，後擔任過班級黨支部書記。由於張的“忠誠度”，1978年8月，張德江被派赴朝鮮留學，在金日成綜合大學經濟系學習，並任留學生黨支部書記。

張德江以“左”得出奇、見風使舵而聞名，曾撰文反對私人企業家入黨，但在江澤民提出私人企業主可以入黨後，立刻180度大轉變，不斷表態擁護江的講話。張德江多次上台演唱京劇《紅燈記》中的《窮人孩子早當家》和《智取威虎山》中的《打虎上山》。張德江在進入最高層之後，在其操縱下通過“一國兩制”白皮書，此舉激起香港民衆怒火，促成了香港“雨傘革命”爆發。

俞正聲，這個被大陸網民戲稱為“拼爹時代終極版”的太子黨，也少不了紅衛兵背景。18歲的俞正聲從有“紅色貴族學校”之稱的北京四中畢業後，考入當時最有名的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彈道式導彈自動控制專業。“文革”開始後，哈軍工的學生造反派分為“山上派”和“山下派”，兩支人馬旗鼓相當，勢均力敵。據宋永毅披露，俞正聲在“文革”初期是紅衛兵，參加過批鬥校黨委、黑龍江省委的“造反”。有知情者稱，俞正聲當時是“山上派”。

據說與薄熙來一樣，俞正聲也回過北京，批鬥過其母親范瑾——母親當時被打成彭真死黨和“三家村”黑線人物，再加上她曾對外講過丈夫俞啟威與藍蘋的姻緣，被江青恨之入骨，對她全國公開點名批判。

俞正聲的暴行成爲導致惡劣後果的因素之一：范瑾被關進監獄，俞正聲的姥姥則被從北京的高幹住宅紅霞公寓趕出來住進一所工棚。他的全家在“文革”中死了九個人，其中他奶奶是因為斷了生活費而被活活餓死，一個年方19歲的妹妹因神經錯亂自殺身亡——與家人的厄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俞正聲在“文革”期間相對政治安全。

值得一提的還有俞正聲不佳的民間口碑。他主政上海時，上海人對他的觀感相當負面，比對他的前任陳良宇差多了，主要由於俞任職上海期間，上海經濟發展失去原本的良好勢頭而逐步陷於停滯，上海市民生活水平下降，其主導制定的上海戶籍新政導致外來人口大量湧入，引發上海城市資源不堪重負、犯罪率上升和本土文化流失等種種社會問題。

在上海“11·15”特大火災後，基於上海市政府救災不力，有人在網絡上製造出一道“名點”：魚一條，素雞若干，七喜飲料一瓶，而被稱作“魚素雞七喜”，其實是上海話“俞書記去死”的諧音。基於他的年齡和表現，上海部分政界人士對俞正聲入常感到意外，而上海普通百姓對其能離開上海大多歡呼雀躍。

1947年出生的劉雲山不僅在“文革”期間是紅衛兵，而且是現實政治中毛澤東思想最堅定的支持者，有“中共新左王”之稱。劉雲山在領導中宣部的很長時間裡全面肯定毛澤東思想，比如2009年中宣部拋出“六個為什麼”，全面肯定毛澤東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三大改造的所謂“功績”；他在建國60週年大慶時大搞“毛澤東思想萬歲”宣傳方陣。這些做法使毛派極左勢力獲得了話語權，阻止政治體制改革，導致公權力缺乏制衡，使黨政腐敗迅速蔓延。

原北京大學經濟學副教授夏業良於2009年在個人博客上發出公開信，批評劉雲山“不學無術”，“控制國民思想和阻礙學術自由”，夏因此被解聘；前中共陝西省委副秘書長林牧指控以劉雲山為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作惡多端；2014年8月底，四川作家鐵流更在網上發表文章稱：“劉雲山是中國新聞出版貪腐集團的總後台，是中國改革開放前進道路上的死敵，也是習李王新政最大的干預者和反對者。他比鄧力群更壞，比胡喬木更左。鄧力群雖壞，但不貪腐；胡喬木雖左，卻有人格操守。劉雲山是個’五毒’俱全的偽君子，無德、無才、無能、無操守、無品德，最大本事是吹才拍馬……”鐵流於9月中旬被北京警方刑拘。



劉雲山

至於王岐山也不例外，與大多數同齡人一樣，1948年出生的王岐山參與過紅衛兵，1969年來到陝西延安馮莊公社插隊勞動，後以“工農兵學員”身分，被推薦進入西北大學歷史系學習。他的岳父，是中共第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曾有評論人士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王岐山：他是一個“草根式的、知識分子式的、紅衛兵式的、太子式的、我行我素的、聰明加魯莽的等多重人物、性格的集合體”。與毛澤東一樣，王岐山是個“老菸槍”，無論到哪裡出訪，無論住的是多麼高級的酒店，無論酒店有多麼嚴格的禁菸規定，只要一入住，王岐山第一件事就是點著一根菸，開始噴雲吐霧，引發警報器也照抽不誤。

再說1946年出生的張高麗，一樣是個老紅衛兵。BBC報導稱，張高麗和目前許多中共最高層官員一樣，在“文革”期間屬於所謂“紅衛兵大學生”，於1970年畢業於廈門大學經濟系。不為人知的是，張高麗本人出生在福建窮苦農家，他的家族，父親早逝，遺下兄妹五人由寡母帶大，幾乎全是毛澤東的忠誠追隨者，尤以他大哥為甚。

據福建政府主辦的海峽消費網刊文透露，張高麗的大哥因響應毛支持國際共產革命的號召，“早年在菲律賓的戰場犧牲”。張的大哥是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偷渡菲律賓，參加菲共游擊隊與政府軍打仗時戰死，“換到今天不得了，起碼是志願軍英烈，可惜當年弟弟（張高麗）官太小，連烈士都沒混到”……

另類總理被全面削權

中共七常委中另類當屬“二當家”李克強了。李克強“文革”高潮時，尚是小學生，應該只能算是“紅小兵”，“文革”後期當知青去了安徽鳳陽。

李克強可能是唯一一位步入政界後選擇與毛澤東影響保持距離的政客，分析人士說，這主要源自於李憑藉自己的能力，在“文革”後考入北大，並接受了系統化的法學訓練，這一經歷使他區別於其他依靠血統和人脈關係讀書的領導人，而系統化的教育無疑是消除毛澤東遺毒的必經階段。但可惜的是，正因為李克強區別於其他紅衛兵，所以儘管位居中共二把手高位，但他卻是“有史以來最沒有權力的總理”。

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起草說明中說道：“議題確定後，中央政治局決定成立文件起草組，由我擔任組長，劉雲山、張高麗同志為副組長，相關部門負責同志、部分省市領導同志參加，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領導下進行全會決定起草工作”；在四中全會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起草說明中說道：“黨中央決定成立文件起草組，由習近平總書記擔任組長，張德江、王岐山同志擔任副組長……”習近平還提到，文件起草組有兩位省裡的領導同志參加。《新京報》記者獲悉，“兩位省裡的領導同志”為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和浙江省長李強，兩人都曾擔任過所在省分的政法委書記一職。



李克強

全面深化改革方案在起草時居然沒有中央行政首腦的參與，那麼最為艱難與重要的行政體制要如何改革，如何推進？依法治國決定的起草沒有國務院總理的參與，該決定中占內容1／3的“依法行政”要如何實施？——何況李克強是真正法學科班出生的總理！

此外，此前一般由國務院總理擔任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也改由習近平擔任，在溫家寶之後，李克強徹底喪失了對中國經濟改革的領導權。一個紅衛兵色彩相對淡化、提倡改革的國務院總理，卻被削權至此，不禁令世人惋惜！

在中國，每個時代的執政者都有其獨特的精神風貌。江澤民、朱鎔基從小學到大學都在中華民國“國統區”完成（江澤民還在日偽統治下的南京念過兩年中央大學），胡錦濤、溫家寶受的是“十七年修正主義”的中共教育，毛澤東曾經斷言這一批人靠不住。江澤民愛背誦英文名篇——1986、1989年兩次學潮期間，江澤民與上海學生對話，當理屈詞窮、無言以對時便用英語背誦美國《獨立宣言》和林肯《葛底斯堡演說》，質問學生：你們能背下來嗎？你們懂得什麼自由民主？溫家寶善吟中國典籍和古典詩詞……而有著博士頭銜的習近平，雖然在正式外交和公共場合，也常引用古人警句，但他脫口而出的似乎還是“紅寶書”和毛澤東詩詞——這證明了，他終身未癒紅衛兵知青後遺症。

紅衛兵領袖出獄轉入商界

與政壇一樣，在中國商界，紅衛兵們也正當壯年，這些“毛主席的戰士”正以他們獨有的思維模式，統治著數十萬億的資本帝國，並藉此引領中國。

在“文化大革命”中，北京的紅衛兵分為“天”“地”兩派。天派領袖之一，是北京航空大學的韓愛晶，地派領袖之一，是北京地質學院的王大賓，他們倆和北京大學的聶元梓、清華大學的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共稱“五大學生領袖”。1968年毛澤東為了穩定高校，派工宣隊進駐高校，卻受到了紅衛兵的抵制，還發生了流血武鬥。7月28日，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接見紅衛兵五大領袖，同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長達五個小時之久，中心意思就是批評紅衛兵，要他們聽從指揮。意味深長的是，五大領袖中除了中年早逝的譚厚蘭，其餘四人雖都被判處了刑罰，但出獄後都成為了商業領袖。



除了譚厚蘭，紅衛兵領袖出獄後都成為了商業領袖。左起聶元梓、譚厚蘭、王大賓、韓愛晶、蒯大富。

地派領袖王大賓在1983年出獄後開始了經商，曾任都江堰市都信鑿岩釬具有限公司的總經理，同時還兼任中國鋼協釬具協會常務理事，中國岩石破碎學會常務理事。他的公司生產的拳頭產品，已出口中國香港、東南亞和澳大利亞，成為中國商業鉅子。

天派領袖韓愛晶出獄後被安排到兵工廠工作，並分了房子安了家，之後也到深圳去經商。深圳有幾家大公司慕韓愛晶之名，聘請他出任老總，賺取了第一桶金，一些大股東還主動出資註冊了一家獨立法人的信息網絡公司，交他管理。

至於“文革”中叱吒風雲的蒯大富，坐了17年牢後出來，亦到深圳下海從商，在一家照明工程公司任總經理並賺取了價值不菲的財富。而聶元梓在獲准保外就醫後一度生活困窘，後來化名王蘭做生意並很快致富，甚至還出資助家鄉建設。

四大領袖的人生軌跡，折射出紅衛兵們在中國商界的影響。這四大領袖，都屬於上面所說的造反派紅衛兵，在“文革”後是受到貶抑的，尚且如此，事實上中國的頂尖資本家群，從歷屆首富到商業領袖，幾乎無一不是紅衛兵們佔領了。

先看首富們的紅衛兵背景。馬雲，現任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2014年3月美國財經雜誌《財富》（Fortune）公布“全球50位最偉大領袖”，馬雲排名第16。2014年8月，彭博社認為馬雲擁有218億美元淨資產為中國首富。2014年9月發布的胡潤百富榜也證實，馬雲家族以1500億人民幣財富首次問鼎中國首富，成為胡潤百富榜創立16年來第11位中國首富。然而在輝煌背後為多數人所不知的是，馬雲還是個典型的紅衛兵、毛澤東的崇拜者。

1964年出生的馬雲小時候經歷過“文革”動盪，鳳凰衛視在節目中專門提到了馬雲曾經在“文革”後期當過紅衛兵，過度的政治熱情使得馬雲數學成績一落千丈。1982年，馬雲參加第一次高考，數學只考了一分。1983年，第二次參加高考，還是落榜，數學考了19分。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對於毛澤東思想的關注和研讀。在他看來，毛澤東在軍事和思想上有很多東西是值得企業家學習借鑒的。“我覺得我們這代人，60年代的人不可避免地都學習過。”2001年到2003年是阿里巴巴最艱難的時期，馬雲就推行過三種“毛澤東式”的管理運動。他認為，這種形式對於企業管理變革而言，是最為有效的。

首富談毛澤東兩眼濕潤

舉例來說，馬雲曾以“延安整風運動”來統一價值觀、統一理想，他說：“通過運動，把不跟我們有共同價值觀，沒有共同使命感的人，統統開除出我們公司”；以“抗日軍政大學”來培訓幹部團隊的管理能力；以“南泥灣開荒”培養銷售人員面對客戶應有的觀念、方法和技巧。而在阿里巴巴的人力資源體系中，甚至直接照搬毛澤東當年組建紅軍的“政委”系統。該系統從2004、05年開始打造，根本原則是：“把支部建在連隊上”。“我們希望‘政委體系’的思想滲透到人力資源工作的每一個環節中，深入到最基層的部分。一個公司最核心的作戰單位就是主管所帶領的10到20人，他們一邊做業務，一邊思考信仰。”

宗慶後，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在《2012胡潤百富榜》中，宗慶後家族以800億成為當時中國首富（隨後又被《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確認），與馬雲不同的是，由於其祖父曾是張作霖手下的財政部長、父親在國民政府當過職員的成分問題，“文革”期間雖然苦苦追求，但仍沒能成為紅衛兵。但儘管組織上沒有加入紅衛兵，但思想上卻是實實在在的老紅衛兵。

宗慶後說，給他影響最大的就是毛澤東，對《毛選》他能倒背如流，並從毛澤東思想、特別是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中汲取了無限的“養分”。宗慶後曾說：“你去看看中國現在成功的大企業，都是一個強勢的領導，都是大權獨攬，而且是專制的。”而他的飲料帝國的崛起，也是借鑒了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軍事策略。

牟其中，前南德集團總裁，在1990年代中期一度被評為中國“首富”。牟比宗慶後大四歲，成名更早，相同的是兩人都有“紅衛兵情結”。據媒體報導，有人親眼見過牟其中談到毛澤東時，兩眼濕潤的景象。經商後，他甚至梳起了一個毛式的大背頭，還學毛的作為，故意去長江游泳，拍了一張“到中流擊水”的照片。

而2004年30歲便問鼎中國首富的IT鉅子、盛大網絡CEO陳天橋，也自稱是崇拜毛主席的紅衛兵。在陳天橋的辦公室裡，看不到什麼跟網絡遊戲有關的擺設，相反在書架上醒目的擺列著一套《毛澤東選集》。陳天橋曾經模仿毛式語言專門寫了一篇《論“新文化運動”》，在盛大公司內部開展文化整頓。“戰略上蔑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是陳天橋最喜歡的一句毛澤東名言。有意思的是被稱

為“中國打工皇帝”的職業經理人唐駿也是個紅衛兵，他曾經包了一個專列，帶領員工浩浩蕩蕩上井岡山朝拜。陳天橋與唐駿在崑山飯店相識，兩個紅衛兵相見恨晚，並由此開始了新的合作……

要學毛澤東的“流氓性”

除了首富們，衆多商界教父級與新生代領袖更是不折不扣的毛澤東的衛兵。

從年齡結構上看中國商界的幾個教父級領袖如柳傳志、張瑞敏、任正非，幾乎無一例外是出生於上世紀40年代、參加過“文革”的老紅衛兵。在具體表現上，柳傳志在大學時代就是造反派的領袖，他治理聯想頗多權謀之術，其中與倪光南之爭、制衡郭為、楊元慶關係以及收購IBM等等，不乏毛式風格。柳甚至不無得意地說：“個人崇拜，外人覺得好笑，當事人是迷在其中……”而張瑞敏則不止一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崇拜，他甚至表示，毛主席的成功正是贏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做企業也是一樣，如果按書上的常理來出牌，永遠贏不了。



“中國流氓軟件之父”周鴻禕。

至於神秘的華為老闆任正非更是忠實的“毛粉”，據一名跟隨任正非多年的老員工介紹，任正非很喜歡讀《毛澤東選集》，一有閒工夫，他就琢磨毛澤東的兵法怎樣成為華為的戰略。而此前，任正非在部隊與“文革”期間就是“學毛標兵”。甚至任的內部講話題目也刻意的與毛選的文章題目相同，任正非積極在銷售上實施“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而在內部，則實施一人化的集權獨裁。

在中國商場的新生代領袖中，崇拜毛澤東自認紅衛兵的更大有人在。如巨人集團老闆史玉柱，《毛選》早已背得滾瓜爛熟，在他的書架上只有兩種書：研究偉人的和研究戰爭的。在其產品的戰略方針中，也頗多當年“農村包圍城市”和“發動人民戰爭”（人海戰術）的影子。

而奇虎集團董事長周鴻禕更醉心於毛澤東的“流氓性”，他不止一次強調“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首要問題。”為了打擊競爭對手不擇手段，他推出過中國早期影響最大的流氓軟件“3721”；並因此而得到“中國流氓軟件之父”的惡名。此外自認紅衛兵的新生代商業領袖還有：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牟其中的弟子）、紅桃K掌門人謝聖明、三株藥業集團董事長吳炳新……

統治中國的政商兩大利益集團，被紅衛兵們佔領了。那麼在成功掌控中國後，紅衛兵們又會以什麼樣的風格來統治中國呢？

這話題還真不好說，借用毛澤東著名的語錄來說，“文革”一定在他們今天的執政傾向中打下深刻的“階級的烙印”。從好的方面來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文革”中都下過鄉、當過兵、吃過苦，甚至坐過牢，有著長達十年乃至二十多年的基層工作的經驗，對社會民生有深切的體察。然而，消極的方面、乃至完全的負面影響可能更大。比如，他們目睹了甚至參與了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文革”中血腥骯髒的權力鬥爭，因而都具有一身早熟的政治權術，兼有“小毛澤東”的稟賦。

對同志，殘酷鬥爭

人的品性基本上取決於他成長過程的兩個主要因素：一是成長環境，二是思想教育。不妨先回過頭來看看紅衛兵的本性，或許會有些許啟迪。

紅衛兵真正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人，這一代人的整個成長期，中國正陷入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無休止的階級鬥爭，也就是無休止的整人鬥人殺人，攪得整個中國腥風血雨。紅衛兵的整個成長過程，正是中國陷入人類歷史最反智的時代，紅衛兵是真正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一代人，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有兩個基本點：一是階級鬥爭，二是唯物主義。有分析人士指：這種思想決定了紅衛兵的本性，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殘忍，二是貪婪。階級鬥爭思想造就了紅衛兵的殘忍，唯物主義思想造就了紅衛兵的貪婪。

的確，縱觀中國政壇，一方面以習近平為首的前紅衛兵，正將殘忍的鬥爭哲學發揮到極致，另一方面利益集團的貪污腐敗，則是紅衛兵貪婪本性的大暴發。這幾乎是習近平政權的全部。

在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與毛澤東的實踐中，為了權力可以不擇手段。從AB團事件，到延安整風運動，到反右運動，再到“文化大革命”，這一切，究其本質都是為了奪取最高權力而對政敵實施無情打壓。有了這樣的先例，紅衛兵們自然不甘落後。

1966年“文革”爆發，紅衛兵運動興起，高幹、軍幹子弟集中的中共貴族中學一馬當先，侮辱尊長、批鬥老師、折磨名人、毀壞文物、打人抄家等傷天害理的醜惡行徑，發源於主要由“紅二代”組成的老紅衛兵。身為聯動核心分子的薄熙來不僅宣稱與父親斷絕關係，據稱在薄一波批鬥會上為表“決裂”還曾動手打過父親。“幹革命”六親不認，乃至“大義滅親”；“奪權”心理變態，乃至喪心病狂，這樣的人，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而在中共黨魁喪失權威性的今天，紅衛兵當道，“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可能成了中共不少類似薄熙來之流具有“遠大抱負”者的想法，於是中國政壇局勢在動盪中迎來了權力鬥爭的新紀元。

首先是薄熙來學毛澤東煽動民意來“造反”。性格張揚的薄熙來在競爭皇儲過程中最終落敗於習近平。2007年10月薄熙來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11月30日接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作為一位深受毛澤東影響的投機政治家，薄熙來選擇了煽動民眾對現狀的不滿推行左派政治路線，利用強大的“民意”要挾並與中央對抗，從而為自己在十八大上的升遷積累政治資本。薄熙來任內掀起“唱紅歌、讀經典、講故事、傳箴言”的運動，重慶電視台不再播放商業廣告，並向各學校指定27首必教必唱的革命歌曲，又發布《毛澤東語錄》等紅色短訊，使重慶有“西紅市”的稱號。

習近平效仿毛整風清黨

在“唱紅”的同時，自2007年11月，針對重慶黑幫組織勢力猖獗並與中共黨內人士勾結的問題，薄熙來效仿毛澤東“文革”運動的方式，在重慶展開“打黑除惡專項行動”，截止2010年5月1日，打黑行動已抓獲涉黑涉惡人員4781人，14個涉黑涉惡團伙受到致命打擊，多名涉嫌腐敗的警方人員、中共及政府官員落網，包括重慶市原司法局局長文強。

事實證明，隨著“唱紅打黑”運動的興起，薄熙來在民間的威望遠勝於同期謹言慎行的習近平，有政治分析人士指，薄在民間的威望，加上他在高層盟友的支持，如果沒有後來的突發政治事件，足以倒逼中央實現篡位目標。但可惜的是，他時運不濟，後院起火，最終身敗名裂。



雲南徵地現場，村民以血還血。

紅衛兵們“你方唱罷我登場”。隨著薄熙來表演的結束，在民間有“小毛澤東”之稱的習近平開始

走向台前。以突發政治危機為契機，習近平效仿毛澤東的延安整風運動，以反腐為名，掀起了繼“文革”之後最大規模“清黨行動”。

嚴格意義上講這場黨內大清洗始於“王立軍叛逃事件”，並在十八大習近平繼位之後達到了巔峰，圍繞著薄熙來、令計劃、周永康、徐才厚“新四人幫”進行。在2012～2014年，實現了對“薄熙來政變集團”的圍剿，先後將薄熙來與徐才厚斬於馬下，並實現了針對“政法王”周永康的抓捕，打破了“刑不上常委”、“查不涉退休”的高層規則，從2014年起，習近平又開始了針對“令計劃政變集團”的圍剿，重創令計劃的團派、山西朋黨——據明鏡新聞網披露，在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成功說服高層下決心拿下令計劃，而此前他的哥哥與弟弟已經相繼落馬……

據人民網2014年10月28日報導，自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以反腐為名拿下的省部級高官已經達到了54名，其規模之大超過了“文革”之後的所有政治清洗。而在整黨的同時，習近平還學習毛澤東樹立權威統一思想的做法，在僅僅執政兩年之後，便在四中全會公報中，將黨的指導思想由“三”變“四”：在“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之後，加上了“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

然而這一切也許只是個開始。有分析人士指出，由於兩位太上皇在位，儘管習近平的清黨行動效果顯著，但顯然他仍然無法實現對常委與政治局委員層面的控制，而習近平要樹立毛澤東式的權威，在十九大上是否能夠控制中央委員的多數派是最關鍵的一步，但是目前看來團派與上海幫的影響猶在。所以可以想像，一場規模更大，更為殘忍的政治清洗正在醞釀之中。

對人民，殘酷鎮壓

階級鬥爭思想的核心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用暴力奪取政權，用暴力鞏固政權。政治評論人“閒人維杰”曾表示，在中國政壇，殘忍早已變成一種強烈的政治意識。不殘忍就是政治立場不堅定，而這無異於是自己堵死自己的前路，而基於紅衛兵們的經歷，他們往往比一般政客更加殘忍，甚至他們為此而自豪。而紅衛兵的這種暴力特性表現在對內政策上即是：對人民的殘酷鎮壓。

這種以暴力鞏固政權的意識不僅在政壇的紅衛兵中流行，商界紅衛兵也是如此。例如2013年7月13日起，在《南華早報》刊發的馬雲系列訪談錄中，馬雲在回顧阿里巴巴公司遭遇的“欺詐門”、“支付寶拆分”等危機時說：“一家公司的CEO，無論是阿里巴巴事件也好，無論是支付寶的拆分也好，你在這個當口上，好像鄧小平在‘六四’當中，他作為國家最高的決策者，他要穩定，他必須要做這些殘酷的決定。這不是一個完美的決定，但這是一個最正確的決定，在當時是最正確的決定。任何時候，一個領導者是必須要做這樣的決定。”馬雲甚至還據此誇讚中國互聯網管制很有水平。

據2012年12月1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的《2013年社會藍皮書》指出，中國社會現階段正處於矛盾多發期，近年來每年因各種社會矛盾而發生的群體性事件多達數萬起，甚至十餘萬起，並且報告預期未來幾年內將更不樂觀。群體性事件涉及的社會衝突有三個焦點問題：徵地拆遷、勞資關係和環境保護，徵地拆遷導致的群體性事件佔50％左右，環境污染加上勞資關係問題引發的群體事件佔到30％左右，其他的佔20％左右，環境保護問題正日益成為社會問題。那麼針對如此之多的群體性事件，中共又是如何應對的呢？

很簡單，如“六四”一樣，暴力鎮壓！而這種傾向在習近平執政後表現得尤其明顯。自2013年以來，成都市反對PX項目事件、昆明市反對PX項目事件、浪波村土地維權事件、湖南臨武群體事件、京溫事件、江門鶴山反核事件、茂名市反對PX項目遊行、晉寧血案……樁樁件件，沒有一例最終不以警察暴力清場作為結束。顯然習近平在打倒周永康、將政法委收入麾下之後，不僅沒有反思周永康時代的暴力維穩模式，反而加大了暴力維穩的力度。

然而如此暴力鎮壓人民，中共也必將付出血的代價。以晉寧血案為例（官方稱為晉寧縣富有村“10・14”事件），據雲南省政協前副主席楊維駿介紹，晉寧縣農地市價為400萬元/畝。村民表示，開發商“承諾”的補償標準是12萬/畝，後卻又變成每人4.3萬元。在如此不公平的補償標準下，村民自然不願意並前往施工處阻止動工，於是在官方默許之下，2014年10月14日上午，開發商招集了數百名打手，手持武器，前往村民聚集處實施鎮壓。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村民在得到消息後也手持武器應戰，雙方發生了大規模械鬥，詭異的是，儘管在械鬥之前與之中，村民數度報警，但當地警方卻拒不出警干預……

不過戰鬥結果卻完全出乎了中共官方的預料，訓練精良的“鎮壓部隊”被奮起反抗的村民完敗。據昆明市新聞辦公室10月28日通報，事件中有四名建設方僱員被燒死，兩名建設方僱員被打死，另一名建設方僱員搶救後不治，兩名村民喪生，另有24人受傷。有網友高呼：人民以二比七的代價，終於狠狠教

訓了獨裁者一下！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對內鎮壓的過程中，紅衛兵們還非常善於“鼓動仇恨”以達到轉移視線維護統治的目的。而這一點當然也是源於毛澤東的階級鬥爭理論，將人類劃分為兩個對立的階級，鼓動他們去仇恨，達到為己所用的目的。

以香港“佔中”為例，自2014年初起，習近平便開始有步驟的“鼓動仇恨”。

眾所周知，“佔領中環”運動在2013年初便開始醞釀了，幾經博弈之後，習近平顯然堅定了自己“假普選”的意志，“佔中”將不可避免。然而如何處理“佔中”對大陸民眾的影響成為當務之急。在中國大陸民主意識萌發、公民社會轉型的當下，如果讓大陸人了解了香港民眾“爭普選”的訴求，勢必將在大陸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一發不可收拾。



中共向非洲輸出“中國模式”抵銷西方的人權努力。

於是“製造敵人、鼓動仇恨、轉移視線”便成了最好的手段。自2014年初起，官媒與騰訊、新浪等集中報導香港的負面新聞，利用大陸人在港旅遊期間的衝突性新聞，刻意誇大港人對大陸人的歧視；而當2014年1月2日與10月13日兩度出現“港獨”新聞時更盡全力報導，刻意製造“佔中”本質是要“港獨”的假象，從而利用大陸人的愛國主義熱情，爭取他們對“中共香港政策”的支持。於是乎香港人爭民主與普選的訴求就被掩飾得一乾二淨了。

令人遺憾的是，習近平這一手腕似乎取得了想要的效果。據《紐約時報》2014年10月11日報導，在大陸年輕人同情香港“佔中”者寥寥，接受採訪的年輕人都對學生和占領中環抗議行動表達了懷疑，他們對香港的“獨立”傾向非常敏感，甚至敵視。不少人怨恨地說，在香港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出生和長大的人，有一種優越感，“香港人驕縱，以自我為中心”。30歲出頭的李方（音譯）是一位教授，批評香港人拒絕說普通話，而且對北京提供的經濟利益缺乏感激。“香港人似乎只考慮自己，”他說，“他們從來就沒想過大陸。”一名讀政治專業的女子甚至說：“根本不懂中國，有時候就應該把嘴閉上。”

顯然上述論斷是受到了官方輿論造勢的影響，當然也不具備正確性。例如香港可能是對大陸貢獻最大的地區了，從辛亥革命對大陸的支持，到改革開放給大陸的經濟供給，再到“六四”期間對大陸學運的聲援，說“香港人只考慮自己，沒想過大陸”顯然是錯誤的。大陸青年的這種心態，顯然忽視了兩地共同的“民主訴求”。

對外國，輸出獨裁

眾所周知，毛澤東時代在外交上實施向第三世界“積極輸出共產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強硬政策。那麼輪到紅衛兵們執政後，他們又將如何呢？曾經有網友戲侃中國的外交政策是：對外屈膝投降，對內殘酷鎮壓。習近平自然是要改變這一印象。

毛澤東可以輸出共產主義革命，紅衛兵當然可以輸出“中國模式”。所謂“中國模式”，是指中國自改革開放開始，尤其是在“六四”後經濟和政治的發展模式。以國家干預市場的手段保證經濟增長，宏觀調控，但是也產生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發展。它被認為是一種政治上的獨裁政體與國家資本主義的混合體。與毛澤東輸出革命，對象多是貧窮國家一樣，紅衛兵們輸出“中國模式”，多集中在非洲國家。

中國對非洲不顧人權的經濟掠奪，損害當地工業，被西方國家普遍視為新殖民主義。中共聲稱，它投資非洲不附加條件，“不干涉內政”，即無視當地人權狀況，唯利是圖，藉以抵消國際社會改善非洲人權的努力。證據顯示，習近平執政後非但不準備停止這種掠奪，甚至還在掠奪的基礎上積極向非洲獨裁者們推銷中國模式。而由於中國極權主義繁榮的誘惑力，越來越多的非洲國家開始接受中國模式。

據《紐約時報》報導，在中國政府的積極推銷之下，一些非洲國家心照不宣地依照一種模式來構建本國政府，這個模式眾所周知，被稱作“中國模式”。例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和烏干達等國，這些國家都經歷過內戰，它們的領導人給國民提供了一個並未明言的交換條件，用發展和穩定來替代健全的民主制度。獨裁者們開始學習中國的治理經驗，一些連續當政幾十年的領導人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推動了經濟增長，而且在某些程度上，還推動了健康、教育以及發展。

這些國家在發展模式上擁有諸如以下共同特點：政府對於金融、經濟都有非常直接、影響力大的干預和調控；政治組織方面，由政府決定，不進行民主討論，對政治自由容忍度低；對於官員的任用，利用層層選拔的制度而非選舉，選舉投票僅僅是內部而且實際作用較小；對於言論自由和媒體出版限制嚴格，以維持意識形態的大體一致和社會穩定；不贊同西方國家的主流價值觀，不支持“西方民主政治”與市場經濟……當然如此模式必然導致國家資本主義與裙帶資本主義的腐敗，主權高於人權，穩定壓倒一切的政策必然導致本國人權環境的嚴重惡化，此外還有貧富差距所帶來的挑戰。

以安哥拉為例，大量的近海石油貯藏，使安哥拉成了非洲第二大原油生產國，在多斯桑托斯總統建造的這個國家裡，保時捷（Porsches）和蘭博基尼（Lamborghinis）在城市街道上穿梭，到處聳立著豪華住宅樓，穿著考究的人們在收取100美元服務費的夜店裡跳舞。但是，幾百萬安哥拉人被拋在了後面。在住頂層公寓、手眼通天的富人和住貧民窟的失業窮人之間，橫亙著巨大的鴻溝。

頗有意思的是與中國一樣，在這種獨裁模式下，感到挫敗，並且備受壓抑的卻是中產階級，而不是那些沒能享受到經濟快速增長的好處的窮人。因此，儘管在安哥拉中產階級發起一次次抗議活動，但由於缺少人數眾多的窮人的支持，抗議最終都被中國式維穩給壓制了下去。評論人士指出，正是中國模式給非洲那些本來搖搖欲墜的獨裁者們一記“強心針”，紅衛兵們正在阻止世界的民主化。

紅衛兵周永康貪污近千億

除了迷信暴力與殘忍外，紅衛兵們另一個顯著特徵莫過於貪婪。唯物主義無神論衍生出兩層的生存意識：一是及時行樂，二是不怕報應。

及時行樂帶來窮奢極欲。而人的欲望是一個無底洞，越是追求物欲享受，欲望的黑洞就越深，人心就越是貪婪。不怕報應變成窮凶極惡。

那麼紅衛兵們究竟貪婪到何種地步了呢？先以已經落台的薄熙來與周永康為例。

據人民網北京9月22日電，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薄熙來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貪污金額達到2179萬元。位居政治局委員的高位卻只貪污了“這麼點錢”，薄熙來甚至在網絡上得到了“清官”的美譽。



紅衛兵袖章重新走紅。

至於周永康，他是個“大學紅衛兵”。公開的資料顯示，儘管周永康是在1966年畢業於中國石油大學，但由於當時中國剛剛開始“文化大革命”，各大學都已“停課鬧革命”，各派紅衛兵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四處“造反”，大搞武鬥，周永康也被迫留校一年參與“造反”。那麼相比較薄熙來，周永康又貪婪到了何種地步了呢？

雖然周永康的案子尚未進入司法程序，但據路透社2014年3月30日報導，有消息來源稱，針對周永康貪腐案，當局至今已經沒收了價值至少900億元人民幣的財產。路透社引述三名與北京高層有聯繫的消息人士說，在過去四個月裡，檢察院和中紀委在北京、上海等五個省市搜查多個地點，凍結了超過370億元

的銀行存款、價值510億元的中外債券，查封了價值17億的約300多處房產、價值十億元的古董、名畫，以及大量人民幣和外幣現金、黃金、名酒和超過60輛名車等。有分析說，儘管當局仍未公布周永康案，但外界了解到的周永康貪腐程度之深、範圍之廣，令人髮指，堪稱中共建政以來最大貪腐案……

被習近平打倒的紅衛兵貪婪至此，那麼沒有被打倒的當權派紅衛兵又乾淨到哪裡去呢？

身為當代紅衛兵的“總司令”，習近平怎麼可能缺失貪婪的本性！2014年6月4日，在這個異常敏感的日子裡，《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肖建華，六四後起家的億萬富豪》的文章，文章刊登了一份頗為關鍵的商業交易記錄：《紐約時報》瀏覽的企業記錄顯示，2013年，肖建華聯合創立的一家企業出資1500萬元人民幣，收購了習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持有的一家投資公司的股份。這筆交易完成的時間，晚於2012年6月彭博新聞社發表的那篇關於習近平親屬的家族財富的文章。

儘管尚不清楚習近平家族的資產出售規模，但提交給政府的公司記錄顯示，過去數年中，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和姐夫鄧家貴還出售了在中國其他幾家公司的股份。

就在該文刊發的第二天，肖建華便委託自己企業的一名女發言人做出聲明，聲明試圖解釋為何自己參與創建的康海天達公司在2013年1月出資1500萬元人民幣，收購了習近平的姐姐和姐夫所持的CCB International Yuanwei Fund Management的50％股份。稱那筆交易沒有不尋常之處。聲明還說，當習近平家族以150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出售所持股份時，這個價格與該家族幾年前的入股價格一致。習近平家族“自動退出其辛苦創業合法經營的商業項目，退出的項目基本和投入等價或者承受了較大損失”，聲明中寫道，“因此可證明，其股東並沒有利用家庭影響而賺取任何額外商業利益”。

顯然上述報導完全證實了此前的2012年6月，彭博新聞社對習近平家族的資產做出的報導。在該報導中，彭博社表示，蒐集的公開資料表明，在習近平在黨內逐步攀升時，他的親屬們將商業利益擴展到了礦業、房地產、手機設備等領域。“這些利益包括在總資產達3.76億的眾多公司中的投資，包括在一家資產達到17.3億的稀土公司的18％的間接股權；還有在一家公開上市的科技公司價值2020萬的股票。”

此外，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查到習家在可以俯瞰南中國海的香港的山頂，有一座價值3150萬元的別墅。連接著電線的門鈴搖搖晃晃，鄰居們說這幢房子已經空了多年。習家在香港至少還有六處房產，總價值據估計有2410萬元……即使是不包括尚未查出的習家財富，但就彭博社會布的財富檔案也足以證明習近平是一個巨富——幾乎很難想像依據中國現有的公務員薪酬體制，習近平和他的家人可以聚集近30億人民幣的財富。不僅僅是習近平，掌控中國的紅衛兵們幾乎無一人不因貪婪而涉嫌腐敗。

劉雲山及其家族醜聞及貪腐數額與周永康不遑相讓。大兒子劉樂飛身為“中信產業基金”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仗父權勢在金融界長袖善舞，參與了阿里巴巴在美國的上市；劉二公子劉樂亭叱吒於內蒙古醫藥保健、房地產界等。劉氏家族至少坐擁數百億財富，富可敵國。

另據披露，王岐山的妻子姚明珊在美國舊金山灣區擁有兩幢價值共420萬美元的豪宅，其中一幢位於當地薩拉托加市的高尚住宅區內。《星島日報》後來證實道：“該幢兩層樓高的獨立屋建在一個小坡上，粉牆紅瓦，周圍遍植高樹，私密性很好。整塊地皮周圍都設有鐵柵欄，車道入口亦有鐵門。門前掛有一個‘小心犬隻’的英文標誌。”……

寄希望於這代紅衛兵們實施政治體制改革，完善中國的民主轉型機制，顯然已經不具備多少可能性了。至於習近平執政後反腐敗、依法治國聽起來固然很美好，但其實質卻是糟粕叢生（政治局常委腐敗至此又怎能自己反自己？），中共沒有任何人能回答“黨大還是法大？”習近平指示兩個30年彼此“不能否定”，這也是發揚“紅衛兵精神”，“誓死捍衛毛主席”。在一個正常的文明社會，不小心碰了別人的腳後跟尚且要道歉，為什麼殺人整人餓死人、打砸搶燒挖祖墳的前30年滔天罪行卻不能否定？或許習近平之所以這麼做，是在捍衛自己的過去，捍衛自己的“信仰”。

一個笑話看紅衛兵的崛起

在中國除了政壇商界的紅衛兵外，在民間還活躍著基數很大的大眾紅衛兵。與高高在上的政壇與商界紅衛兵相比，這些紅衛兵們雖然沒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與財富，但由於人數眾多，足以摧毀掉中國社會脆弱的倫理基礎。目前看來，他們的確做到了！

在大陸流傳這樣一個笑話：一老頭在公園裡打太極拳，一招一式都顯得很有力道。這時候來了個年輕人說：“老大爺功夫這麼好，怎麼練的？”老頭說：“我站著不動，用你最大的力氣來打我試試！”於是年輕人用力打了老頭一拳，結果……被訛了兩萬六。

這個笑話是對“老人變壞”現象的辛辣諷刺，在很多中國人的記憶中，談到老年人一般都代表著處事講規矩，待人有禮貌，把品行看得很重。然而，到了最近五年間，情形大不相同了。吐痰、吵架、罵

街、打赤膊、不排隊、高聲喧嘩、攀折花木、不走人行橫道，長者的數量在增多；在城市裡的小區門口，總看見有人白髮皤然，卻雙手抓住樹幹來回晃悠，自稱鍛煉。在公交車上還有這樣一幕，一排四人的座椅，一對老夫婦佔了兩個半，請他們挪動一下，竟被老太太罵了15分鐘——罵人算輕的，打你又如何？

2013年3月12日，鄭州一網友上傳了一段時長33秒的視頻，並很快在網絡上傳開：一位老人上了公共汽車後，因一位女孩沒看見他因而沒有讓座，隨即發生口角，老人在快下車時竟將女孩打了一頓。

無獨有偶，單打竟改成群毆：據《楚天都市報》2014年9月4日報導，一位坐在公交車老年座位上的年輕人因沒讓座，遭幾名老人暴打。事發後，漢陽警方到達現場將其帶走。據悉，五名老人都六七十歲。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這些作惡的“新晉老人”大多出生於1949年之後，在他們的成長時期，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有過“文革”中參加紅衛兵組織的經歷。曾經叱吒風雲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們，正在步入退休年齡，變得有時間開始更多的參與公眾生活，於是在沉寂了40年後，紅衛兵們在民間再度崛起，再度給中國帶來巨大的道德災難。

李源潮應對彭宇案負責

說到這一切，始作俑者首推“彭宇案”。

2006年11月20日早晨，徐壽蘭老太太在南京市水西門廣場一公交站台等83路車。人來人往中，老太太意外跌倒，南京市民彭宇主動陪同老太太前往醫院檢查，檢查結果表明徐壽蘭股骨骨折，鑑定後構成八級傷殘，需進行人造股骨頭置換手術。徐壽蘭隨即向彭宇索賠醫療費，彭宇自稱是樂於助人，怎麼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絕了老人的要求。後在各種調解失敗後，於2007年1月4日在鼓樓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



敗訴後站在法院門口一臉無奈的彭宇。

最讓人震撼不已的是本案的判決書。在明顯事實不清，雙方證據都不足，且目擊證人支持彭宇的情況下，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樓區法院主審法官王浩對彭宇案做出了一審判決，稱“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並下判斷說：“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對此案的結論是：“本案中，發生事故時，老太太在乘車過程中無法預見將與彭宇相撞；同時，彭宇在下車過程中因為視野受到限制，無法準確判斷車後門左右的情況，故對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過錯。”“本案應根據公平原則合理分擔損失，本院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人民幣4萬5876元較為適宜……”

這個判決書嚴重背離事實並缺乏法律支持。法律專家們指出，其判定大量使用的“常理”並不符合社會認識，但由於法官所用之“常理”具有法律效力，將會強制性地修正社會原來的常理認知。自此，一審法官所用之“常理”逐步成為新的社會規範，社會道德風氣劇烈滑坡。

另外，次要爭議是，民事訴訟是否可以無證據，僅憑常理推斷？中國民事訴訟準則明確規定“誰主張誰舉證”，而法院卻在原告方未能提出有力證據的情況下，運用“自由心證”的邏輯推理分析，判定彭宇應承擔責任。為彭宇作證的陳先生在得知結果後激動地說：“朋友們，以後還有誰敢做好事？”

當然，法官也許是不得已，事實上該案早已是“政治審”了：進入到2007年，彭宇案終於迎來了和

解，和解結果並未對媒體公布，相關細節不得而知。但傳言彭宇仍然須承擔莫須有的責任，只是由“第三方”支付，此傳言未獲官方確認。2007年10月15日下午，時任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在中共十七大江蘇省分組討論會上發表講話，專門提到了彭宇案，以其為例介紹江蘇省“大調解”機制，作為其工作政績的展現。

觀察家指出，李源潮很有可能是此案的幕後操縱者，李也許更應為彭宇案惡劣的社會影響負關鍵責任。

扶不起來的紅衛兵老人

不管如何，彭宇案為紅衛兵訛詐青年人提供了極好的先例，此後老人訛詐好人現象絡繹不絕：

2008年6月16日中午，陝西省西安市，20歲的河南小伙張衡見一位老人倒在地上，便好心去扶起來。誰知道老人一把抱住他，說是他倒車時撞上的。事發現場很多人證明張衡是冤枉的。

2012年1月16日傍晚，廣東省佛山市，一位老伯行過斑馬線時，在一台停車等待的小車前跌倒。小車車主下車攙扶後，被老伯指為肇事者。雖有人證證實車主非肇事者，仍被交警拖車調查。後來車主因春節快到，怕麻煩，賠錢了事。

2013年7月28日，遼寧省盤錦市，在盤錦遼河油田工作的王蘭乘坐23路公交車去上班。下車時她看到前面有人倒下，出於本能，她伸手扶起老人，期間還有一位熱心人幫著攙扶老人到站點台階上坐下。但後來老太認定是王女士在下車時撞到她才把腳扭了。監控錄像被調取出來，這才還原了當時的情況——老人是自己摔倒的。

2014年3月15日，廣東省深圳市，一老太太摔倒在離公交車有一定距離的地方，司機馬愛平立刻上去攙扶，不料老太太一口咬定是馬未等她下車就關閉車門，導致她摔倒。深圳南山區公安分局公布事發時視頻顯示，老太下車後自行走出三步，隨後一腳踩在台階上跌倒。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基於做好人反被訛詐的“社會常理”，選擇了不救助，漠視他人的生命危機，網友紛紛指出，紅衛兵們終於創造出“扶不起的中國”！

2009年12月6日，浙江省杭州市，62歲的丁大伯走在路上，患有冠心病的他突然一頭栽倒不省人事。當時，不少路人目擊了他倒地，可大家沒人敢碰一下。40分鐘過去老人才被送到醫院，延誤了搶救的時間不幸去世。

2010年12月15日，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一位老人在小區裡跌倒，保安和路人無一上前攙扶。20多分鐘後，老人的兒子外出時發現，老人孤零零趴在地上，額頭磕破流血，鼻子緊貼地面，已沒有了呼吸。

僅14天后，福建省福州市，一位83歲退休老幹部摔倒在人行道上。附近五六人駐足圍觀，但沒人敢出手相助。兩名女子試圖將其攙扶起來，旁人一句“善意提醒”，又讓她們縮回了手。當醫護人員到達時，老人已停止了呼吸，孤獨地躺在冰冷的馬路上。

就在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宣稱“依法治國”之後，據浙江電視台報導，10月27日早晨，長沙市鬧市區一段實時監控畫面顯示，迎賓路一人行道上，一名老伯突然倒地，33分鐘裡有49人路過，卻無人上前幫助，更無人報警。期間，倒地老伯因胸口不適還做出按壓的動作。等到第50名路人報警後，老人已經失去了呼吸。經診斷，老人死因為心臟病突發。

網友“不字忠情”評論道，毋庸贅言，每個時代都會有為老不尊的人，但這個時代因為有了紅衛兵變得尤甚。從某種意義上講，變老的紅衛兵正在突破社會底線，而他們的舉動正在持續讓社會變得更壞，政界與商界的紅衛兵們在政治和經濟層面破壞中國，而平民紅衛兵們則在社會、心理和人際關係的基礎層面破壞中國，真可謂“能量大無邊”！



黃怒波認為紅衛兵是“邪惡的一代”。

曾經是紅衛兵的詩人兼中坤集團董事長黃怒波在《文革記憶之邪惡的一代》中這樣描述紅衛兵商戰，卻也適用於政壇：

“如果一個人戴過紅袖標當過紅衛兵，那他就足以在這個世界上混下去。如果一個人後來又插過隊到過兵團，那他當商人就足以在這個世界上發大財。如果有兩個這樣的人在商場相遇過招你死我活，那這樣的商戰一定驚心動魄下流無情。大家都當過爺，現在又是大爺，合作不愉快就必然玩命。我們是造過反的人，決不能按常規情理出牌。一個民族走過邪路，它就會有邪惡的一代。……財富並沒有讓我們升華高尚，因為我們曾經當過紅衛兵。打住，在21世紀以紅衛兵的方式決定勝負。”（張鵬 專稿）